

# 进击吧！文学！

□贾 想

文学正在突破自带的“INFP人格”，走出深宅大院，走出封闭、守成、内倾的舒适区，走向熙熙攘攘的市井人群，走向互联互通的数字世界，走向发达的现代传媒网络。文学正在努力恢复自鲁迅开始的强健的新文学传统——为人生、为平民；努力回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甚至梦想回到自己最初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形态：街谈巷议。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题 记

## 一、“纯文学”及其观念的落寞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在文学的边界之内谈论文学，以内行人的身份说内行话。我们经常把大众没有掌握的知识资源挂在嘴边，包括东西方文学史、中外文学理论、层出不穷的文学术语、自产自销的文学概念，言之凿凿地谈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现象。这一套复杂、精密的知识工具箱，让文学创作和研究成为了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或者说一门学问。结果很自然，文学的创作与评论有了一定的门槛，形成了专业性的壁垒，正如一座深宅大院。其中门槛最高、处于核心位置的正殿里，供奉着自带光环的三个字：“纯文学”。

“纯文学”的“纯”，不仅指文学作品质地之“纯”，还承载着一价值观念上的“纯”。这种“纯”的观念相信，文学是一个自足自治的存在、一个独立性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作为对现实世界实际的摹仿或应然的想象，可以与现实平起平坐、相互抗衡。因此，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艺术性、思想性、情感性，要比文学外部的现实价值——传播学价值、经济学价值、政治价值等，更为重要。

很明显，这不是关于文学的全部观念。伏尔泰的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屈原与杜甫的诗歌、鲁迅的杂文等等——构成了介入现实的另一种文学传统。相比之下，这一套侧重于文学美学属性和形式价值的“纯文学”观念，历史其实很短。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把源头追溯到19世纪的福楼拜，认为他那不做价值判断、客观主义的、“工匠式”的写作，使纯文学观念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赋形。“纯文学”观念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和演变，更为复杂曲折。它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为艺术”的文艺理念出现；1940年代之后一度退到暗处；进入1978年之后，作为对僵死的文学观念的反拨，它借助文学期刊的辉煌，成为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其中“先锋文学”尤能代表其精神特质；再后来，1990年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制度化，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类主流文学奖项的青睐，终于让“纯文学”获得了应有的名分，并乔迁到高校象牙塔这个安身之所，获得了稳定而安全的生存空间。

然而，“纯文学”作为一种先天不足的、现代的艺术观念，一直面临着各种强势的、古老的声音的质疑（当然同时也从没有放弃自我辩护，可以说整个现代性的文学，都是一种辩护式的文学）。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当中，对“纯文学”观念进行了三个层面毫不留情的批评：第一，唯我主义，执着于个人的主观宇宙，对外部世界不信任，或不予理睬。第二，形式主义。采取“工匠式”写作立场，对客观反映历史现实失去兴趣，倾心于叙事技巧、情节结构、文辞语言的雕琢。第三，虚无主义。对古典的人类价值体系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真、善、美、复活、拯救等肯定性价值，不再构成所有作家推进写作事业的统一支撑，苦思冥想的艺术代替了积极介入，改变世界的文学。

托多罗夫的批评不能说刀刀致命，但至少让人难以反驳。他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对于封闭、守成、内倾的文学系统的“不满”。细想一下，他的“不满”指向中国的“纯文学”，似也同样成立。实际上，国内已经有过几次大的争论，集中表达过这种“不满”。离我

们比较近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和这个世纪之初，由于市场化大潮和大众传媒、互联网的冲击，逐步边缘化的文学界发生的两次大讨论。一次事关“人文精神”的生死，一次事关“纯文学”的生死。两次讨论集中展示出“纯文学”以及支撑“纯文学”的人文精神在中国遭受的合法性疑难。近些年，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类型化文学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春风得意，进一步衬托出了“纯文学”处境的落寞——现实层面与观念意义上的双重落寞。这种落寞，让很多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学从业者深感焦虑。

## 二、文学的自救与系统的更新

恐怕还会有人说这些言论是危言耸听，并且还要告诫我们文艺的永恒性比时代性更重要，要以不变应万变云云。但在我的生活中，占据压倒性的还是“不满”之声，至少是“不满足”之声。这些声音来自外部的有之，来自内部从业者的就更多。究其根本，是大家对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小众化、圈子化、板结化、孤立化、无声化处境的“不平、不甘、不满”。

这些意见的存在，说明文学面临的不是零散的、偶发的、暂时性的问题。在时事巨变、媒介革新、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面临的是发展滞后的系统性问题。特别是“纯文学”这个系统，既面临外部影响力萎缩的压力，又面临内部活力不足的困境。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过去一段时间文学界积极求变的行动。这些行动是文学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自救，也是文学系统主动寻求更新的自觉。

2021年，中国作协在十代会上提出“新时代文学”的观念，这是对“纯文学”等既有文学观念的一次改造和更新。观念铺路之后，一些新的文学实践紧随其后。一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出。二是各大文学奖项颁奖的“典礼化”“晚会化”，比以往更为隆重，更加注重彰显文学尊严。“鲁迅文学奖之夜”等颁奖活动，开始采取直播形式，穿插文艺节目，将线下小规模仪式变为线上大规模晚会，将圈内文学活动变成广泛的公共文化活动。三是各类文学报刊开始“阵地转移”，从线下进驻线上，特别是进驻移动互联网端的各类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四是文学报刊的传播观念大大增强，完成向移动互联网的“阵地转移”之后，各报刊依托新媒体，采用图文推送、视频、直播、颁奖晚会等大众乐见的方式传播内容，变文字产品为视听产品，推动文学报刊的数字化转型。五是文学系统内的各平台努力打造自身品牌。鲁迅文学奖、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人民文学奖、花城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奖、凤凰文学奖等奖项的颁发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六是“作家出镜”。在书写时代，一个作家的笔名是他的身份标识。来到视听时代，脸正在替代一笔一划的名字，成为公众辨认和记忆一个作家的标识。过去那种作品出场、作家隐身的观念，正在被作家出镜、作品出圈的观念代替，“姓名经济”正在被“脸经济”代替。市场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求作家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一个好的内容生产者的同时，还是一个好的内容传播者。

这只是文学之变的一部分。管中窥豹，可以见风向：文学正在突破自带的“INFP人格”，走出深宅大院，走出封闭、守成、内倾的舒适区，走向熙熙攘攘的市井人群，走向互联互通的数字世界，走向发达的现代传媒网络。文学正在努力恢复自鲁迅开始的强健的新文学传统——为人生、为平民；努力回到“凡有

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甚至梦想回到自己最初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形态：街谈巷议。

## 三、发展的世界与进击的文学

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发展的世界。歌德曾借浮士德的形象，拥抱改造世界的科技革命，歌颂世界的上升，肯定现代化的发展精神。发展，就是现代社会的内核。在一个文化内容由文字内容转向视频内容、消费方式由阅读转向观看和体验、文化产品由印刷品为主转向数字产品为主的时代，文学——这个古老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天之骄子，受到冷落其实是一个必然。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之中，不进则退，停下就是离场。而文学——无论有过怎样的萎靡和徘徊——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上进之心、创新之心。自古以来，文学不断应时而变，诗、词、曲，志怪、传奇、小说，一时有一时之文学。文学家从来有着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医生发现病灶、思想家提出思想、政治家开始行动之前，察人之未察，见人之未见，在沉默中预见爆发，在暗中预见光。文学看似沉静，实则有着救世的激情，看似缓慢，实则走在时代的前头。那么，在最本质上：文学也从来都是进击的文学。

行文至此，我想起一部漫画：为了躲避神秘出现的人类天敌——以食人为本能的巨人，先人建起玛利亚、罗塞、希娜三道层层相套的高耸城墙。幸存的人类聚集其中，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而且过上了安宁的日子。一百年后，随着一声突如其来巨响，最外侧玛利亚之墙遭到超大型巨人突破，大批巨人大举入侵，人类重新暴露在灭亡的威胁之下。最勇敢的人类组成了一支调查兵团，他们决心探明这个未知世界的真相，跟上巨人们恐怖而遥远的脚步。他们毅然走出了高墙。

——这是漫画《进击的巨人》所讲述的故事。漫画家通过人类、城墙、巨人，构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想象世界，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但同时，这个不可能的故事却能唤起我们强烈的忧患意识。

漫画揭示的，是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人类的基本处境：坚固的城墙，墙内是安宁但闭塞无知的生活，墙外是危险但崭新无边的世界。发展的、辽阔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正以巨人的方式，冲击着传统、保守、静谧的生活，威胁着那个令人怀恋的“昨日的世界”。18世纪，机械制造对传统手工业造成了威胁；19世纪，电力革命对火的地位造成了威胁；20世纪，信息技术对印刷文明造成了威胁；今天，人工智能又对人工智能造成了威胁。

科技发展，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系统。新系统必然会旧系统造成威胁。这是主宰现代化的“发展之神”与人类签订的契约：以不断破坏传统、牺牲安稳为代价，获得文明的发展。

这是一份不平等契约——无论情愿与否，只要我们还想在现代社会好好生存，就必须在契约上签字。

而“发展之神”与文学之间的契约，早已签订。签名的地方，写着一大串我们熟悉的名字：歌德、笛福、伏尔泰、卢梭、普希金、巴尔扎克、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他们，这些进击的文学之子，就是我们的调查兵团。



## 长三角文学期刊主编 共话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5月6日，长三角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收获》《钟山》《清明》《江南》等近2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与会，共同探讨长三角文学期刊如何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由安徽省文联指导，《清明》杂志社主办，芜湖市镜湖区委宣传部、浙江省松阳县文联协办。安徽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查结联主持会议，安徽省文联主席陈先发致辞。

陈先发认为，文学期刊在涵育文学新生力量、激发文学创新动能、锻造新时代文学传世之作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希望长三角文学期刊正在逐步强化的协作机制能进一步制度化、成熟化，成为长三角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亮点。

与会者围绕长三角文学期刊的现状、发展方向及交流合作机制等话题展开座谈。面对互联网、新媒体、ChatGPT等科技浪潮的挑战，文学期刊应该如何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任务，培养青年作家乃至少年儿童对文学的兴趣，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收获》主编程永新表示，文学期刊要抵达丰富多元的文学现场，办刊人的信念和胸襟决定了刊物质量。《钟山》主编贾梦玮认为，文学期刊要尊重作家的个性表达，调动一切力量提供创新的土壤。《江南》主编钟求是提到期刊的“内卷”问题，认为国际性的眼光和全国性的影响是办好一本刊物的重点和难点。《清明》主编赵宏兴认为，办期刊要围绕读者、作者、编者做好工作，三者之间要实现良性互动，缺一不可。

查结联在会议总结中谈到，此次会议为长三角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要以优秀文学“答卷”回答时代“问卷”，全力推动长三角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文学力量。

（清 宣）

# 「小说界革命」之后，笔记消亡了吗？

□陈 爽

## ■ 声 音

笔记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主要在于其是中国“古小说”之一种。在文学史评价抑或小说研究中，笔记远不如“唐传奇”一类的“古小说”那般受重视。实际上，在“小说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唐传奇”的传统影响虽在，但更像是已经消亡的文体，而笔记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展现其作为传统文类的影响力及生命力。

细究起来，与笔记相关的命名繁多。有“笔记小说”“笔记体小说”“札记小说”“掌故小说”“杂俎”“笔记小品”“笔记文”“白话笔记”“新笔记体小说”等等。从这些命名中即能呈现出笔记在文体方面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与小说勾连，另一方面又与小品、散文有关联；一方面是文言小说的代表，另一方面却又有白话语体的新变。围绕着笔记产生的命名争议一直以来都是小说研究者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笔记小说”的命名合理性也一直受到质疑，所以笔记研究长久以来被忽视，而“小说界革命”之后的笔记研究更是如此。事实上，通过研究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后笔记的“遭遇”，有助于探讨传统文类与现代文学观念的龃龉，并能更好地呈现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传统的“断裂”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留下的痕迹与线索，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古代笔记作品内容驳杂，多被归于杂家、杂史、小说家目下，有的甚至游离于三者之间。笔记近代小说文类身份的确立离不开“小说界革命”的推动。清末“小说界革命”为笔记带来的新变之一即是命名的改变。梁启超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类“随意杂录”的作品为“札记体小说”或“札记小说”，他尝试将部分笔记纳入到“新小说”序列中，并在《新小说》第八号开始发表“札记小说”《啸天庐拾异》《反聊斋》《如新室译丛》等作品。梁启超不仅采用“札记小说”的新名，同时在《新小说》中另设有“杂记”“杂录”栏目以供其他类型的笔记发表。这样的举动似乎表明梁启超有意将小说家目下的笔记从芜杂的笔记系统中拆分出来。《新小说》所发表的“札记小说”呈现的固定文体特点是篇末结尾处用以输出价值观念的“作者曰”部分，凡是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这类作品均整饬地保有这一结构，这也是其与“杂记”“杂录”的最大区别。但随着《新小说》终刊，作为“新小说”之一的“札记小说”成为昙花一现的小说文类。“札记小说”的说法则逐渐被“笔记小说”所取代。

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对待笔记的不同态度中，能够显现出近代小说观念到现代小说观念的变化轨迹。梁启超试图将传统笔记的一部分纳入到“新小说”中予以保留延续，而在传统与现代小说观念龃龉下，新文学提倡者则对“笔记派”小说发难。胡适在《论短篇小说》(1918)中以笔记作为“新”的对立面，将其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罗家伦《中国今日之小说界》(1919)认为“笔记派”缺乏思想性。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在梳理了日本近代小说流派后，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弊端在于旧的形式不能够承载新的思想，而像“笔记小说”这样的“某生者体”，更是“跳出在现代空气以外”。

新文学诸人并非一直排斥笔记，在某些时候笔记亦会被当作合适的话语资源取用。1930年代随着小品文的壮大，相关小品文的文章与论著中，笔记常常被作为传统理论资源，用以佐证小品文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进而逐渐形成“笔记小品”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小品文论家一方面借用笔记的传统身份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明确与其划清界限。如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记》(1934)认为小品文用途及范围“非笔记、偶谈、漫抄、丛录等尽之也”。而周作人在《谈笔记》(1937)中虽然表达了“近来我偶想起点前人的笔记”的想法，但又毫不客气地表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写得不好，可是现在没有他们的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笔记的传统文类身份及内容芜杂的特点，使其在适当时机下能够作为合理的历史依据被提及论述，甚至模仿、写作，让笔记得以延续。除此之外，凭借“随意杂录”的文体特点及小说补史的观念，笔记与报刊新闻有所勾连，演变出介于笔记与新闻之间的文本样式，呈现出既像笔记、又像新闻的杂糅模式。这类“新闻体小说”很难说究竟是新闻还是小说，不过报刊在追逐利润、满足观众好奇需要的推动下，对这类作品颇为钟爱。1927年6月16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启事：“本刊专收新闻性质之短隼文字，与近人之珍闻轶事，删报从丰，他种作品，盖从割爱，幸勿见疑，短篇小说亦请暂停，自由谈部启。”尽管《申报·自由谈》声明读者要求每周三会刊登一篇短篇小说，却未能实现承诺，某种程度上，新文学运动多年后，《申报·自由谈》上的笔记一度“战胜”了短篇小说。由此可见，这类杂糅作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或许正是这种“他种作品，盖从割爱”的做法，使得黎烈文担任编辑之前的《申报·自由谈》被看作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30年代末期笔记写作逐渐式微，之后笔记似一度消失不见，而80年代笔记又以“新笔记小说”的形式出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文类不会轻易消亡，通常会以其他样貌表现出来。“新笔记小说”的写作与命名，使得笔记成为唯一被冠以“新”名的“古小说”。

虽然笔记在文学研究及作品评价方面远不及其他古代文类，但它却展现出远超过其他“古小说”的生命力。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究其根本与笔记自身所具备的特点有关——“随意杂录”、篇幅短小、内容芜杂、于史有补等，这些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笔记不足的地方却使它能够处在变革之际“随机应变”：成为“新小说”之一，与小说组合成“笔记小说”，与小品组合成“笔记小说”，与新闻杂糅成“新闻体小说”，又在80年代与白话语体结合成“新笔记小说”。贺麦晓指出，“新文学必须只被视作中国现代诸多文学文体的一种，在战前几十年的全部时间里，它一直与其他文体共存，并相互竞争”。事实上，当我们细致梳理笔记的变化轨迹，便能够清楚看到传统的余响是如何呈现出来，也能够切入到“小说界革命”、新文学运动之后观察文学的另一个维度，进而更能够有助于文学史的重写。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民国笔记体小说文体问题研究”[XSP21YBC269]阶段性成果）

## 开创书写紫禁城历史的新范式

本报讯（记者 王冕）4月25日，以“巍巍六百载丹宸宸，巩固千年华夏魂”为主题的《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箭亭书店举行。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该书作者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鸿文，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洪波，漓江出版社社长刘迪才，故宫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等出席并发言。在座谈环节，阎崇年、毛佩琦、吴十洲、何孝荣等专家学者围绕新书及各自与作者的交往展开交流分享。

紫禁城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它的建筑、文物与宫廷历史文化是有机的统一。《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由漓江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将紫禁城置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格局中，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地呈现了紫禁城的整体史，开创了书写紫禁城历史的新范式，是故宫学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内容广博、逻辑清晰，在每个主题方面下设几个分述部分，下面又有若干节。书中有有人、有故事、有文物，力图呈现出一座生动、立体、传承变化着的紫禁城，使读者对其600余年的沧桑历史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会上，郑欣淼阐述了该书的创作思路。他表示，这部书从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建设史、作为朝廷的政治史、作为宫廷的生活史、作为故宫的博物院史这四个方面着眼，希望向读者展现一部完整的紫禁城史。

## 关仁山《白洋淀上前传》首发

本报讯 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主办，安新县作协、安新镇王家寨村委会协办的《白洋淀上前传》新书发布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河北省作协主席、该书作者关仁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郝建国，安新县作协主席阿民，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玉晓等参加发布会。

《白洋淀上前传》以白洋淀上纯水村王家寨为故事发生地，选取百岁老人铃铛奶奶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王家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和人物命运，绘制出一幅白洋淀上的百年红色画卷。郝建国在介绍《白洋淀上前传》的策划与出版情况时说，关仁山的很多作品都以农村为创作对象，继承了河北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三卷本《白洋淀上》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这部小说的序曲，《白洋淀上前传》讲述了发生在白洋淀上的震撼人心的往事，溯源影响深远的红色基因。梁鸿鹰谈到，《白洋淀上前传》是一部献给土地、献给白洋淀、为白洋淀及河北人民写心立传的作品，凝聚了作家对于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深切认识和阐释，体现了作家对生活和人民的热爱。

为创作这部小说，关仁山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以历史观照现实。他说：“历史像一个大巨大的迷宫，巨大的磁场吸引了我，激发了我的艺术想象。当发现百岁老人铃铛奶奶原型的时候，我几乎彻夜难眠，于是有了这部书写白洋淀百年历史的作品。”

发布会还举办了赠书仪式，花山文艺出版社分别向安新县作协、王家寨村委会赠送了《白洋淀上前传》。

（冀 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铁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 王铁仙同志逝世

王铁仙，中共党员。著有专著《瞿秋白论稿》《瞿秋白传》《瞿秋白文学评传》《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散文集《平静》，编著《（新青年）（新潮）作品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文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等。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等。